

坦率地说，我关注双雪涛的时间并不长，但他的小说总是以一种别样的风格触动到我。最新推出的小说集《飞行家》收录了他近两年来所写的九篇小说，也是他自觉探索小说艺术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其实，好的小说家就如同一名飞行家——他会引领我们去领略无数迷人的风景，特别是那些我们肉身到不了的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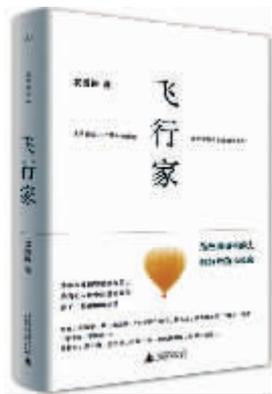
值得庆幸的是，双雪涛就是这样一位小说家。尽管同为80后作家，但双雪涛的身上却没有同代人挥之不去的那种青春倦怠，抑或怅惘悠长，相反，他的小说总是为被大时代湮没的“零余者”留下斑驳的倒影，并将之映照在历史的波澜之上，从而将历史与个体所构成的复杂张力尽数显现。书中收录的首篇小说《跷跷板》就是这样一篇极具历史感与反思性的作品。刘庆革的拖拉机厂曾经是效益最好的“国企”，但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声中逐渐没落。拖拉机厂之于刘庆革不仅是用来谋生或盈利的手段，还灌注了厂长刘庆革最真实的生命体验，甚至已经成为了他生命里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可以说，在刘庆革（甚至作家本人）看来，他与工厂相连

的那些荣誉、辛酸、内疚的刻骨铭心远比这个时代奉行的“成功”和“金钱”的价值标准更加重要。显然，作家关心的是这个动荡不居的大时代里普通人的命运。

当历史与个体狭路相逢，它们常常会以极端的方式宣告各自的存在。于是，无法和解而酿成的凶杀案成为双雪涛小说中的一大标识。无论是早期的《平原上的摩西》，还是最近的《跷跷板》《北方化为乌有》《刺杀小说家》，凶杀案都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跷跷板》借助回忆，勾连出一段不为人知的谋杀案。《北方化为乌有》又将一个惊心动魄的密室杀人事件，置于东北老工业区兴衰的宏大背景之上。而到了《刺杀小说家》中，刺杀行为本身就显得莫名其妙和荒诞不经。来自旧时代的尸体躺在城市边缘的废墟中等待发现，凶案

——读双雪涛小说集《飞行家》

■杨毅



《飞行家》
双雪涛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是这个工业城市的底色。或者说，这个城市本身正是新时代的一桩悬案。无论如何，通过营造凶案来讲一个猎奇的故事并非双雪涛的本意。这位作家的野心乃是将类型小说的悬疑因子，与荒诞、多重

叙事、蒙太奇等现代小说技法相融合，从而获得讲述中国故事的现实关切与历史关怀。从总体上看，小说的节奏把握得沉稳从容，戏剧性张力在具有历史深度的氛围中不断拉紧。

如果说以上这些小说集中体现了双雪涛关注历史变革与个体命运之间的复杂关联，那么以《宽吻》为代表的小说则是双雪涛将视点移焦当下，从而关注现代人精神状况的力作。

这是一个“向死而生”的悲伤故事。长期被人当宠物一样的豢养，使得海豚不仅彻底迷失了自己，而且丧失了捕食的能力。“所以你看看到的海豚，基本都是瞎子，只是因为熟悉地形，所以还能游。”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莫过于这些痛苦不堪的海豚最终会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这种痛苦。究其原因，“游泳池不是大海”——这

无疑是整篇小说的题眼，它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原本属于大海的海豚，而今“它的归宿就在游泳池里”。

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虽然写的是海豚，但很明显，那些痛苦不堪的海豚何尝不是现代人的自我隐喻？那种被豢养起来，靠取悦主人而获取食物的生存状况何尝不是现代人的真实写照？那些困守在游泳池，永远都无法回到大海里的艰难处境何尝不是现代人的一种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愿意把《宽吻》看作一篇寓言体小说，因为从海豚的困境中，我们清晰地辨认出自己灵魂深处的不安。就像双雪涛在本书的序言中所写：“重要的并不是谁创造了这个东西，重要的是你摸到了她，闻到了她，认出了她，然后认出了自己，原来你也在这里啊，哪怕只有一瞬，我也感到满足。”

这本小说集《飞行家》直面历史与个体的紧张时刻，也触及历史与现实的渐进关系。当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叙述不断延展并最终交汇，我们才发现，俗世奇人的故事背后，是个人与时代的错位。最终，历史的遗迹在日常生活的变迁中被逐步拆解。

清晰的语言消失在沉默的行动中

——读阿兰·巴丢《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

■徐兆正

在《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里，阿兰·巴丢具体地探讨了维特根斯坦的修辞学：从《逻辑哲学论》时期到《哲学研究》时期的过渡，以及转变的内部动机。阿兰·巴丢有言在先：（受限于德-英两种语言的互为干涉，以及奥地利用法的影响）他无法宏观地考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表达方式，而只能基于其前后两个时期的对立，研究他文体内部的转变动机。作者无疑是敏锐的，他首先就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写作“总是处在相对的和不确定的位置上”。然而为何如此，却没有急于给出一个答案。毋宁说，阿兰·巴丢接下来分析的是哲学传播与交流的方式。

存在一种最贴切的方式，在诸种策略里，那就是面对面的哲学交流：一方提出问题，一方给出答案。交换看法与互为答辩不仅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彼此的理解，也排除了任何境况的怀疑可能（即时的沟通能够迅速消除不理解）；其次的途径是练习，再次是教科书，最后才是独立意义的哲学作品（“书”）。

作者对哲学这几种交流方式作的排序，尤其是将“书”置于最末一席，并非不可理解。因为前面几种无一不是“朝着理性劝诫目标的自然矢量”，简而言之，它们蕴含着循循善诱的劝诫目的，其所指向的都是学生或将要成为门徒的人（与宗教等质齐观）。但“书”不同于面对面的口头交流，——在这里“书”被区分为两种含义——它要么是对无法重现的课堂教学的一次徒劳尝试（课堂听讲的潦草记录），要么是纯粹私人性的思想记录（因为主体的反复思索而难以辨识）。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书”，它们的重要性均远不及口传意义的哲学讲授。

这一难局（对哲学的目的来说，“书”几无必要性可言），无疑极大地抬高了哲学写

作的技艺门槛：“它总要考虑赢得赞同，这就需要实现预见尽可能多的反驳意见”，而哲学话语的组织方式则必须“防止任何异质性的东西潜入，也不作任何澄清，以免欺骗穿帮”。质而言之，“书”如若想争取到尽可能多的重要性，其句法就必然是坚实的，其本质亦必然是独断论性质的——无论它如何高调地宣扬心灵的自由。

尽管如此，阿兰·巴丢依然认为由坚实句法锤砸的断言式作品，免不了让人疑惑，而这一困境归根结底应回溯至哲学作品书写的教学目的（说服）上。哲学家在写作时不可能不使用日常的词语，但为了服务这一根本需求，语义的普遍性必然要发生“扭转和外延”；进一步说，即便哲学家不使用日常的语汇，他们转而另造新词，新词的词义与已然发生扭转的日常语汇也是殊途同归的，此即令人费解和疑惑。

那么，哲学写作的普遍困境意味着什么？阿兰·巴丢指出这困境主要是哲学作品总是在以下二者之间不断地摇摆：a.系统化，公理化，晶体的单一性；b.修辞化，诗化，绝对的歧义性。

在《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看来，“问题在于产生一部没有外延的作品。”他明确反对词语具有歧义性，也因此反对任何修辞力量的介入。他希望通过清楚地处理可说之物，从而让不可说之物自行显现于沉默当中。维特根斯坦急于将哲学从清晰的语言让渡给沉默的行动，因为对他来说，行动是价值得以显现的惟一途径，而坚实的句法不过是行动之前的必要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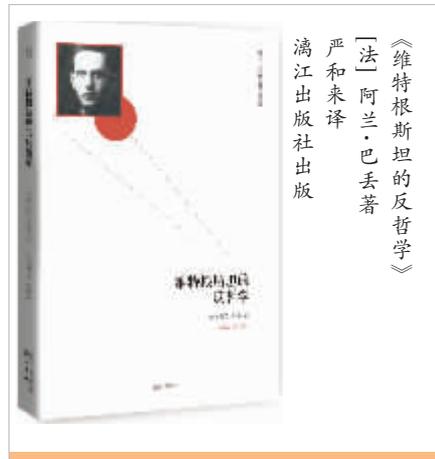
当然，这一时期的维特根斯坦同样受困于哲学写作的普遍困境，歧义性在《逻辑哲学论》里主要表现为“意义”的分割，它被区分为世界之中的意义与世界的意义（价值-意义）。

总的来说，《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风格是这样的：他试图以系统化规避修辞化，用公理化决定诗化，剪辑句法严阵以待歧义性的出现。由于普遍的困境在维特根斯坦这里矛盾加剧，从而无形制造出一种可怕的张力，用阿兰·巴丢的话说，瞬间决定一切才是其风格。

然而到了《哲学研究》时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则急遽地转变为歇斯底里化：提出问题，由答案又变成问题，无休止的放肆追问，毋宁说这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取消了前一时期的那种以句法框定词义的决定，进而导致了词语彻底的不稳定性。但是，从《逻辑哲学论》时期到《哲学研究》时期语言风格改换的深层动机，如作者在本书第一部分所揭示的，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维特根斯坦对“非理论”行动的向往实在不可遏制。由于“厌倦了沉默且徒劳地等待前所未有的行动”，维特根斯坦最终放弃了坚实句法的节制策略，从而投身到对积极的非思想的狂热操演中。维特根斯坦这样阐述他的意图：“矛盾只有在它折磨人时才有意思，因为它既展示着那些令人恼怒的问题如何能从语言中出现，也揭示了何种事情会引起折磨。”

在另一方面，阿兰·巴丢也试图找出这两个时期语言风格的关联之处，换言之，有没有一些不变的因素恒常地存在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中呢？有的。从否定性一面来说，维特根斯坦自始至终都“确信数学具有哲学性的罪恶本质”；从肯定性一面来说，其语言风格的转变也只应被视为一种准备策略的改换，但策略的目标始终如一。这便是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行动一以贯之的是他对“世界的意义”得自我显现的渴慕，是对沉默行动的向往。

在尝试概括维特根斯坦的语言风格



《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
[法]阿兰·巴丢著
严和来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之前，我们不妨先来谈一下阿兰·巴丢的写作风格。毋庸置疑，他的写法非常机智，也非常考验人的耐心；因此，他的片语解纷往往容易让缺乏耐心的读者视为粗陋——就像人们误解尼采那样。阿兰·巴丢坚定地维特根斯坦纳入其反哲学谱系的核心原因，便在于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存在着无法绕开的行动因素。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逻辑哲学论》中的这句格言：“哲学不是理论，而是行动。”同时，还有这一句：“我想我概括了自己对哲学的态度，当我说，哲学应该如写诗般去创作。”（维特根斯坦在上世纪40年代说的话）进而，阿兰·巴丢干脆否认了有哲学语言存在的可能：只存在清晰的表达和诗的写作之间的一种摇摆。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这正是哲学书写的普遍困境。在《逻辑哲学论》时期，维特根斯坦试图以“剪辑的句法原则框范了不可避免的词义变化”，进入《哲学研究》时期后，他取消了这层钳制，因而与前一时期的策略完全背道而驰。他总是在哲学写作的普遍困境里选择一个因素抵靠，又彻底拒绝另一个因素的接近。于是，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要么是难以接近世界的本质，要么是无法说出可言说之物。

阿兰·巴丢最后如此总结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在过多格言或无尽问题的车轮刑罚之下，每一种反哲学都终结为道德神学（或美学，一回事）：只有救赎行动打断批判的喋喋不休。”这便是说，语言最终归于行动，清晰的语言消失在沉默的行动当中。